

新中国 70 年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历程、机理与未来展望^{*}

尹智超 彭红枫

内容提要 回顾新中国 70 年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文章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即“建国初期,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改革开放,继往开来,跨越发展”“加入 WTO,咬定青山,奋进崛起,迈向贸易大国”和“逆流而上,大国担当,自贸区(港)与‘一带一路’多维度开放格局促进世界经贸融合”。其中,货物贸易作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服务贸易方兴未艾,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虽大但未来可期。文章最后论述了中国 70 年来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机理的衍变与反思以及新时期对外贸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创新贸易模式、提质升级实现价值链跃升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中国 70 年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发展历程 机理衍变

作者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DOI:10.13516/j.cnki.wes.2020.09.002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从经济封闭到改革开放,再申请复关、加入世贸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并日趋完善,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的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砥砺前行,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这期间,对外贸易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不断拓展,知识产权厚积薄发,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经过 70 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自信的步伐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以贸易大国的英姿屹立于世界经济舞台。

基于此,本文按照“纵向梳理发展历程—横向比较贸易结构—阐述对经济贡献的机理—展望未来并提出建议”的逻辑主线,从 70 年来对外贸易发展演进以及贸易结构的发展变化来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重点剖析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衍变,进一步阐述当前对外贸易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外贸易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70 年对外贸易发展历程与经济增长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初期,再到以自贸区竞相发展为特征的深化开放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币加入 SDR、一篮子货币定值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均衡研究”(基金号:16ZDA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资本账户开放及其风险防范研究”(基金号:16YJA790040)、“泰山学者”专项工程经费(基金号:ts201712059)的资助。

新阶段,中国不断探索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行解和对外贸易试验场。在这一过程中,外国投资和先进技术大量涌入,新政策和新技术在经济特区和自贸区等经济开放前沿阵地得到检验,并推广到全国。

1.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建国初期对外贸易以服务中国工业化为主

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被美国裹挟实施对华禁运政策。为尽快摆脱困境,建国初期中国采取了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主要贸易对象。特别是通过与前苏联的进口贸易和使用其政府贷款,中国引进了大量用于工业化初期所急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为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努力与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千方百计开拓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和官方贸易渠道,此时的出口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用于换取外汇。

随着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 1972 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中国贸易伙伴国逐渐增多,贸易重心逐渐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转移。为了适应经贸格局的转变,中国开始了外贸体制变革的尝试。1974 年,外贸部外贸经营权下放试点工作开始,在原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和天津五大对外口岸基础上,新增江苏、河北、浙江和广西为外贸口岸,企业对外贸易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如图 1 所示,1974 年中国贸易增速高达 69.39%,规模达到 9.35 亿美元。1975 年,受“以农为本,避免依赖进口”的粮食政策影响,占据中美贸易重要地位的小麦、大豆和棉花等农产品进口订单大幅削减甚至取消,美国对华出口额也急速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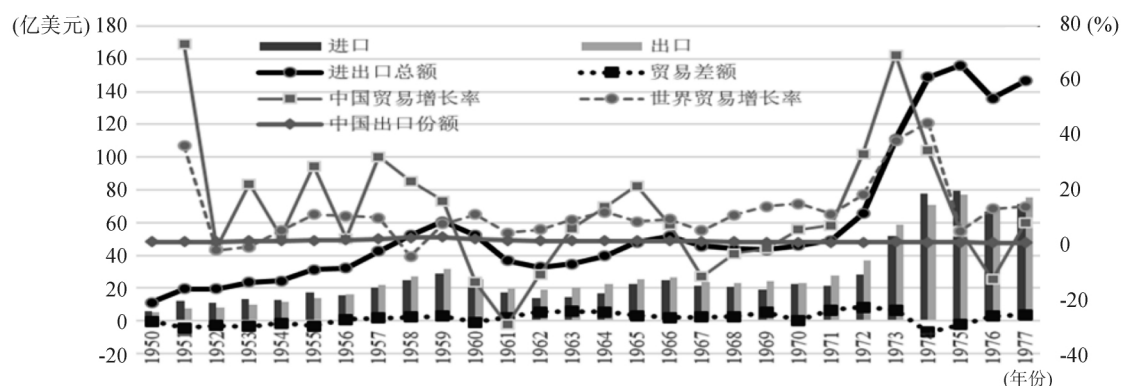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1949 ~ 1977 年)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

从贡献率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中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对外贸易策略,对外贸易以服务中国工业化建设为导向,对经济直接贡献率较低。如图 2 所示,195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为 11.3 亿美元,1977 年为 148 亿美元,28 年间货物进出口累计 1487 亿美元,年均增速 9.96%,略高于世界 8.55% 的年均增长率水平。但是这一时期,出口占 GDP 的比重均值为 4%,净出口占 GDP 比重不到 1%,对外贸易贡献率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受西方禁运、“一边倒”以及随后中苏关系恶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有了较大的波动。1952 ~ 1959 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2.69% 上升至 5.76%,1960 年之后的 10 年贡献率震荡下行,1971 年后受中国和西方外交关系缓和的影响,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回升,1974 年达到 5.58% 的较高水平。

2. 继往开来,跨越发展: 改革开放下对外贸易逐渐形成比较优势

1978 年底,改革开放正式扬帆起航。1979 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建立,特许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上海和天津等沿海港口城市设立外贸公司。同时,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对内改革措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陆续颁布,加大招商力度,鼓励外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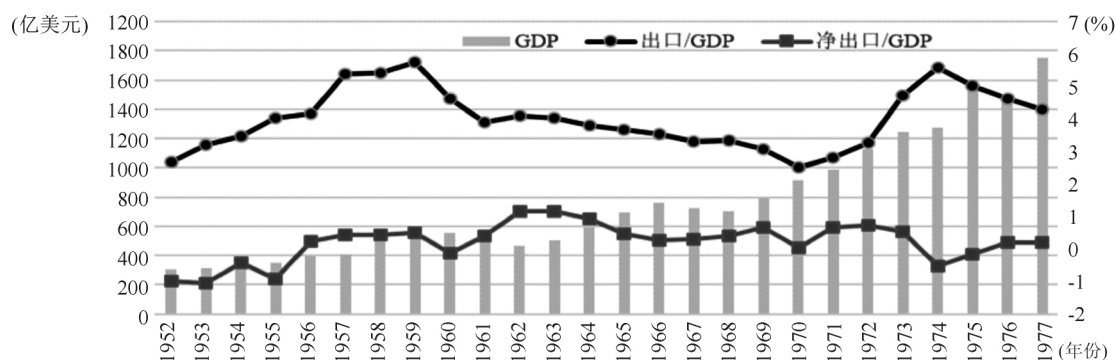


图2 对外贸易贡献率(1950~1977年)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Wind 数据库。

进入; 推动实施税收优惠和出口退税政策, 鼓励出口; 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并设立外汇调剂市场, 提高企业出口创汇积极性; 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 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有力保障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

1986年, 中央“一号文件”规定: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自此, 大批农村青年开始“往外走”, 待遇好、技术要求低的经济特区加工贸易企业成为务工青年的首选。大批外贸工厂在南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同时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优势也初步形成。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 面向内陆“全方位、跨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始形成。同年,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为外贸调控方式向市场化转变提供了保障。特别是1994年中国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 极大激发了出口型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也为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创造了条件。

如图3所示, 从1978年到加入WTO前的22年间, 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10.86亿美元增长至5406.88亿美元, 以高于15%的年均增速远超8.52%的世界年均增长水平。其中, 对外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上升至2000年的3.51%, 出口以16.37%的增速超过进口增速。图4进一步展示了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0年之前, 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平均贡献率约为9.21%, 1990年上升至17.41%, 之后两年有所波动。1994年, 受汇率并轨后汇率大幅贬值的影响, 出口贡献率上升幅度加快, 虽然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 但仍稳定保持在2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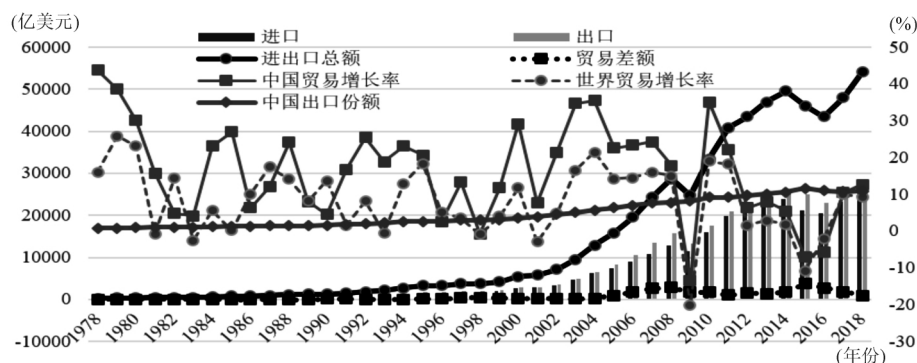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1978~2018年)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

但是, 中国净出口贡献率仍然不高。如图4所示, 在净出口中剔除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 得到货物贸易差额, 其占GDP比重有所上升, 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净出口占GDP比重与货物贸易差额占比

差距明显,这说明在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项下国际收支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相关产业整体上国际竞争能力不足,短期内国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供给无法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暂时需要依赖相关产业服务和技术的进口;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能力增强,境外旅游和出国留学等需求与日俱增,成为服务贸易收支差额中贡献较大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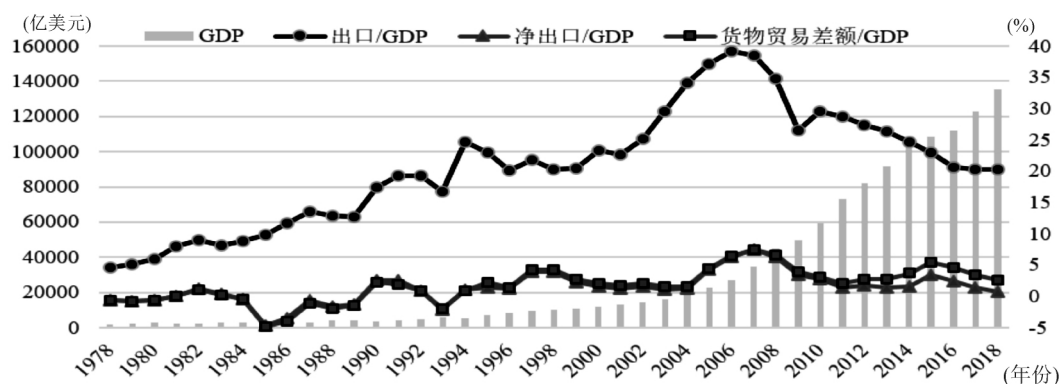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贡献率(1978~2018年)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

3. 咬定青山, 奋进崛起: 加入 WTO, 深度介入全球贸易体系, 迈向贸易大国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开始更为深入地介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加入 WTO 后,中国切实履行承诺,进行了削减关税和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等一系列贸易政策改革,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这些举措大大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使中国经济外向型特征愈发明显。凭借改革开放的技术和经验积累,珠三角和长三角率先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产品生产分工中,订单不断增长,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同时,基于开放服务贸易的承诺,中国服务贸易市场逐渐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发力。

表 1 中国加入 WTO 承诺及改革措施

中国在加入 WTO 时的主要承诺		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	降低关税,10 年内关税总水平由加入时的 15.3% 降至 9.8%	2002~2008 年间,通过调整税率、实施最惠国暂定税率、设定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等措施,分多次下调进出口关税。截至 2010 年 1 月 1 日,所有货物产品的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显著削减非关税壁垒	2002~2005 年间,分批次逐步解除 424 个税号产品的进口许可证、配额以及特定招标、技术检验标准等非关税措施。
	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	2004 年 7 月,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外贸经营权由政府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
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	开放金融服务业(根据一定时间表)和其他服务业,开放通信服务业	2002~2007 年间,中国逐步开放了服务业的 100 个分部门,同时持续减少外资进入的限制,全面履行了该项承诺。
知识产权保护承诺	于 2008 年和 2010 年对《专利法》和《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透明度义务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均按有关规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贸易政策和统计数据定期发布,并定期向世贸组织通报。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披露资料整理所得。

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严重衰退。为缓解外贸企业压力,中国及时采取出口退税等措施以对冲外部冲击,从 2009 年开始,中国环比

出口增长率逐步好转,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总的来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余年间,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践行互利共赢的开放宗旨,中国对外贸易在波折中依然取得了较大规模的增长。2013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也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和投资机会,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4. 逆流而上,大国担当:形成自贸区(港)及“一带一路”等多维度开放格局,促进世界经贸融合

进入 21 世纪,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推动更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合作,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其中上海合作组织树立了互利共赢的新兴区域经济合作典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继欧盟、北美自贸区之后由发展中国家间建立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贸区成为打破贸易发展困境并助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依托。以上海自贸区为开端,2014 年,广东、福建和天津自贸区获批;2016 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自贸区获批;2018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获批;2019 年,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自贸区获批。中国 18 个自贸区形成了“1+3+7+1+6”的雁形矩阵,以“点”带“面”构建起东中西协调联动和陆海统筹发展的全方位深度开放格局,如表 2 所示。

各自贸区以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差异化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带动投资、金融、贸易和政府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变革,构建与各国共同发展的新平台,使中国形成了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根据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World Bank 2019)显示,中国营商环境 2018 年排名跃升至全球第 46 位,自贸试验区建设 6 年期间,排名累计提升 50 位。凭借先试先行的政策条件,自贸区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各地区提质增效引领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新引擎。

特别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原有自贸协定也实现了进一步升级,中国在不断开放国内市场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承担起大国责任,更为深刻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潮中。Soyres 等(2019)的调查发现,“一带一路”使全球货物运输时间平均减少了 1.2%~2.5%,参与国的货物运输时间减少了 1.7%~3.2%,全球贸易总成本降低了 1.1%~2.2%,参与国贸易成本降低了 1.5%~2.8%。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有力助推了全球经济增长与经贸融合。

三、70 年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以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工业制品。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工业制品在商品出口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资源依赖型的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重逐渐上升。2009 年,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3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2015 年保持第一地位。2017~2018 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不断稳固。但是,中国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占比仍然较小,经济贡献率仍然偏低,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无疑成为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不得不逾越的鸿沟。

1. 货物贸易贡献率占半壁江山

建国初期,中国进口品以重工业机械设备为主,出口品以大米、食用油、肉类、大豆、花生和金属矿石原料等初级产品为主。这一阶段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创汇来满足工业发展所需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到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主动权增加,使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出口配额的限制减少,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空间。

如图 5 所示,从货物贸易各子项占比来看,随着中国不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创新,货物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初级产品占比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显著下降,且近十余年占比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中国货物贸易基本依赖工业制成品,其与中国货物贸易增速基本相当,在中国货物贸易中的占比最高且表现稳定。

从货物贸易子项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承接国外服装、家具、家电和食品加工等轻工业转移,中国杂项制品、轻纺、橡胶制品、矿业产品及其制品快速上升,如图 6 所示。2008 年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杂项制品、轻纺、橡胶制品、矿业产品及其制

表 2 中国自贸区战略定位及重点产业

	自贸区名称	包含片区	战略定位	重点产业
第一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承载更多改革空间	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市场准入、商事制度和海关通关便利化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发展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制造业。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	依托港澳、服务内地	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旅游休闲健康、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批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	推动京津冀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重点发展融资租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福州片区、厦门和平潭片区	立足两岸、服务全国	商贸服务、航运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新兴服务、旅游服务和高端制造
第三批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连片区、沈阳片区、营口片区	东北振兴新引擎	港航物流、航运服务、循环经济、先进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科技和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舟山离岛片区、舟山岛北部片区、舟山岛南部片区	海上开放门户	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重点开展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业务。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郑州片区、开封片区、洛阳片区	“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科技金融、大宗商品国际贸易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武汉片区、襄阳片区、宜昌片区	促进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	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海工装备、航空航天、北斗和轨道交通装备等高端产业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两江片区、西永片区、果园港片区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枢纽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	电子核心部件、新材料、物联网、航空器及零部件研发制造、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生物医药、能源环保装备和智能终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天府新区片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川南临港片区	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打造与东部产业配套协作的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临港产业基地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心片区、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杨凌示范区片区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重要支点	人文旅游、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农业领域合作
第四批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全岛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续表 2

自贸区名称	包含片区	战略定位	重点产业
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	济南片区、青岛片区、烟台片区	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发展海洋经济	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现代海洋、国际贸易、航运物流、产业金融、医疗康养、文化产业、信息技术和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	南京片区、苏州片区、连云港片区	“一带一路”交汇点	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和航空物流
中国(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	南宁片区、钦州港片区、崇左片区	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电商、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智能终端、保税维修等出口加工业以及以中药材、调味品为主的农副产品深加工
中国(河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	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国际航空物流以及高端现代服务业
中国(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	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高端制造、航空物流、数字经济、总部经济、信息物流中心、文化教育中心; 加工及贸易、大健康服务、跨境旅游、跨境电商、跨境产能合作、跨境金融
中国(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	哈尔滨片区、黑河片区、绥芬河片区	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寒地冰雪经济、延边金融和进口加工业等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各自贸区管委会网站资料整理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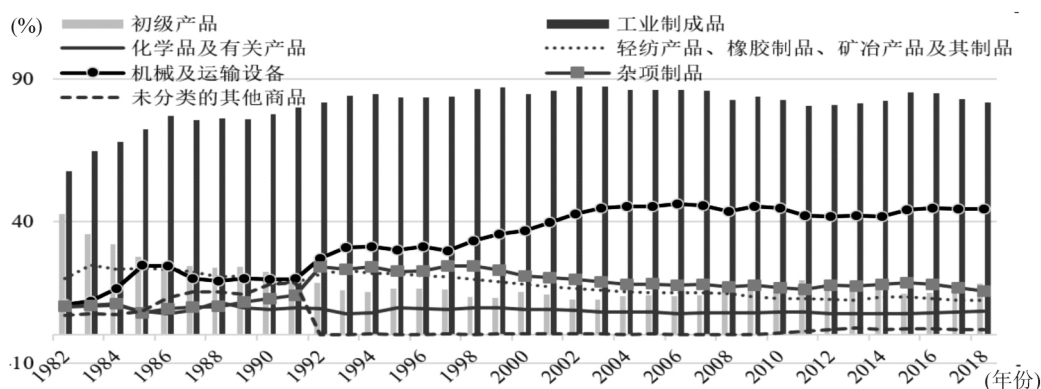


图 5 货物贸易子项占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1982 ~ 2018 年)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库。

成品贸易逐渐下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业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上升。改革开放以来, 工业制成品贡献率与初级产品贡献率渐行渐远,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形成显著差距, 特别是从 2000 年开始, 工业制成品贡献率迅速上升, 虽然经历了 2008 年的周期性下滑, 但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同时, 机械及运输设备从依赖进口形成贸易逆差再到自主制造出口形成贸易顺差, 贡献率从无到有快速增长, 出口额占 GDP 比重在金融危机前达到了 16.8%, 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 47%, 装备制造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2. 服务贸易方兴未艾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中国仅有少量的对外援建和入境旅游等服务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务业体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服务业开放度大大提升, 服务贸易快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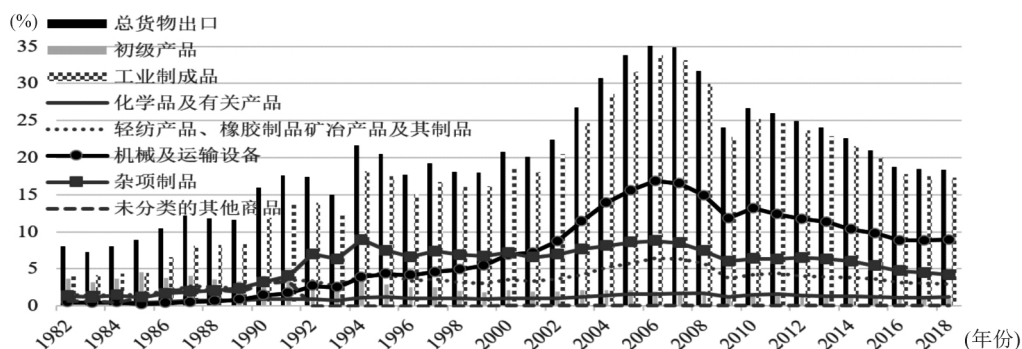


图 6 货物贸易及子项占 GDP 比重(1982 ~ 2018 年)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库。

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改善了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也在扩大就业和节能降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丰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并逐渐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增长”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二是服务贸易“贡献率”仍然偏低且与世界平均水平有明显差距。如图 7 所示,1982 ~ 2018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 46.9 亿美元增加到 7918.8 亿美元,年均增长约 15.3%。其中有两个时期占比迅速上升:第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服务贸易占比迅速增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亚洲各国贸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服务贸易总额及占比出现下滑。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特别是 2012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传统产业在不断谋求转型,互联网经济兴起,现代服务业与互联网相结合不断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及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如图 7 所示,2012 ~ 2018 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外贸比重从 11.1% 提高到 14.7%,服务贸易连续 5 年位居世界第二。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仅相当于货物贸易的 10.7%,服务贸易总规模仍然较小。与世界水平相比,由于中国第三产业先天不足且发展滞后,中国服务贸易与之还有较大差距,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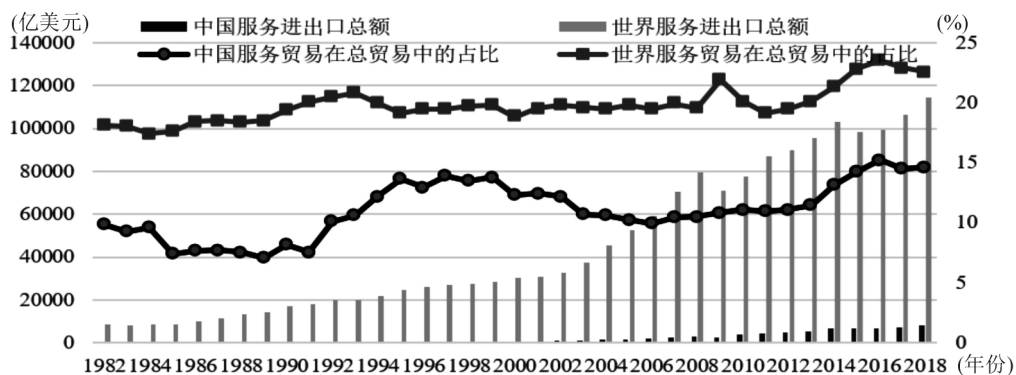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1982 ~ 2018 年)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

在经济贡献率上,服务贸易整体水平较低。图 8 展示了服务贸易子项的经济贡献,1994 年之前服务贸易的贡献率不断增加;1994 ~ 2004 年,服务贸易占比先下降再上升,最终与 1994 年的平均水平相

当;2004 年之后,服务贸易的贡献率大幅下跌。旅游带动了服务贸易的上升周期,运输、旅游以及包括管理咨询服务、研究开发服务和技术服务在内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则在服务贸易的下降周期加速衰减。总体上服务贸易中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贡献率最高,远大于电信、建设、保险、金融和娱乐等行业。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不但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而且在服务贸易结构上主要靠传统服务行业支撑,现代服务部门贡献率很低。其中,运输行业在 1983~1990 年基本为贡献率最高的行业,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旅游业的恢复和发展,运输行业占比逐渐被旅游业超越。随着跨境旅游的兴起,2000 年后中国旅游业顺差逐渐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随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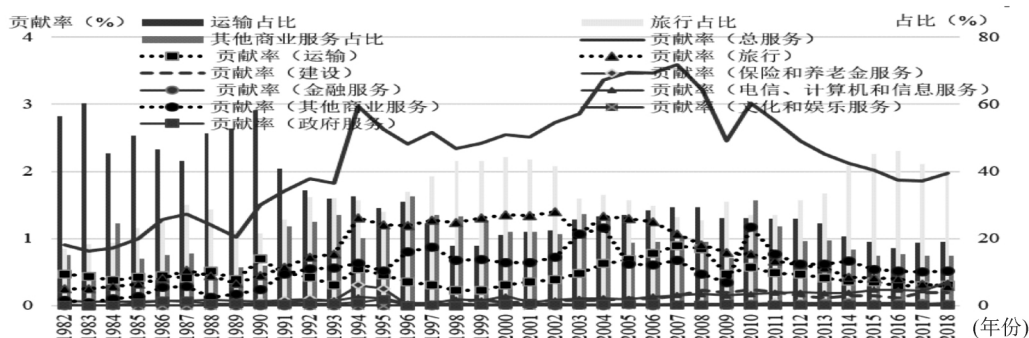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子项占比变化(1982~2018 年)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Wind 数据库。

多年来,中国通过政策引导驱使服务贸易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但由于金融、保险和通信等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没有充分发展,短期内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为主的局面仍将持续。但不必过度悲观的是,中国服务贸易软实力正在提升。根据商务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 2019》(李俊等 2019),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指数全球排名第 20 位,较 2018 年提升一个位次,是唯一进入前 20 的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规模指数位列第 7 位,地位指数位列第 4 位,服务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在显著增强。随着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引领中国数字化变革,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正在赶超世界水平,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正在进一步拓宽,服务贸易正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

3. 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虽大但未来可期

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商业秘密、版权、商标和外观设计专利、新品种所有权、数据所有权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型智力成果的集中展现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革新,对于一国国际地位及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呈现巨大逆差。如图 9 所示,中国知识产权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约为 0.04%,而知识产权最大输出国美国的贡献率保持在 60%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技术、专利和研发等需求激增,特别是高端核心专利技术普遍依赖进口,而外国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使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使知识产权贸易逆差激增。另一方面,中国高端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知识产权竞争力和话语权偏弱,客观上为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出口提供了溢价空间。此外中国受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地位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不强,既难将知识产权转换为产品附加值,也难直接通过知识产权交易获利。

为弥补这一差距,中国在教育投入、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当前,基于中国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支付等领域形成的比较优势以及在半导体、机器人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技术积累,知识产权贸易正加快追赶步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未来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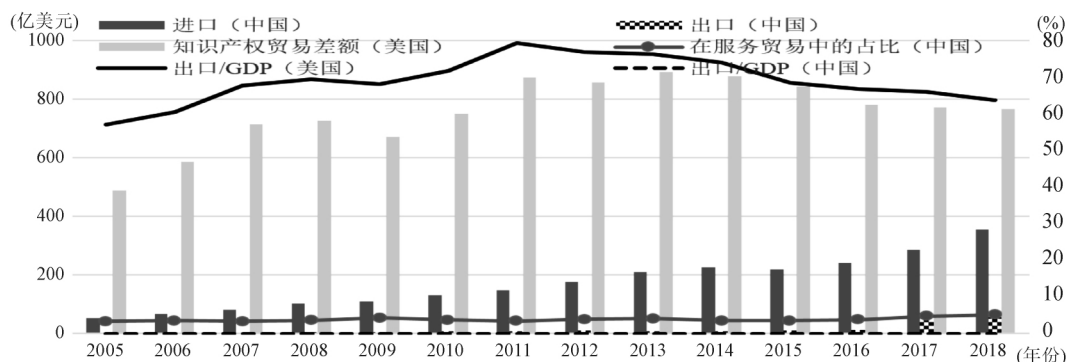


图 9 2005 ~ 2018 年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Wind 数据库。

四、70 年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衍变与反思

通过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梳理和不同贸易部门间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1. 70 年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衍变

(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对外贸易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初步具备出口创汇能力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 二战后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 工业化发展难以为继, 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经济现状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本投入到工业等新兴产业中, 造成经济增长受阻(Lewis, 1955; Nurkse, 1966)。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工业化建设, 中国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 保证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条件下资本集中使用和高效积累。彼时的对外贸易遵循“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 为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服务。由于对外贸易多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机械设备, 在国民经济中仅起到调节余缺和互通有无的辅助作用。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 中国工业体系初具规模, 对外贸易逐渐向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方向迈进。然而, 在西方贸易禁运背景下, 东南亚各国也采取了限制或禁止从中国进口的政策, 对中国土特产和轻工业品的出口造成极大困难。1956 年,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 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在前期工业化建设基础上, 中国工业产品初步具备了出口创汇能力, 新中国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通过当面看货和当面商谈, 开创了以展览促出口的营销方式, 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广交会”逐渐走向常态化, 为世界认识和认可“中国制造”提供了契机, 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 出口商品展览会还传达了中国“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信号, 为突破贸易封锁, 进一步拓展贸易范围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使出口结构有了明显改善,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稳步提升, 逐步赶超初级产品。中国与日本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日渐增多, 贸易品种逐渐多元化, 西方更为成熟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被引进, 提升了工业产能和出口创汇能力, 为中国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物质积累, 为改革开放后逐渐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奠定了工业基础。

(2)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 WTO: 对外贸易通过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每个国家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 集中生产并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有“比较劣势”的产品(Ricardo, 1891)。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 人口红利是解释这些国家形成比较优势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据(Choudhry 和 Elhorst, 2010; 蔡昉, 2010; 刘

方龙和吴能全 2013; 陆暘和蔡昉 2014; 张同斌 2017; 戴翔和刘梦 2018)。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结构的相对变化将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在少儿与老年抚(赡)养负担相对较轻时期,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相对上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Bloom 和 Williamson, 1998)。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充足,逐渐形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国际贸易充分利用这一人口红利优势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理论上,国际贸易通过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表现为:一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下的专业化生产流程使劳动力不断积累相关生产经验,提升本国人力资本禀赋;二是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从而缓解经济发展初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难题,节约本国研发开支。

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宽松的生育政策、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的逐步改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抚养比逐年下降,并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使改革开放恰好契合了人口红利窗口期(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UNPF, 1998)。一方面,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外包和离岸生产的首选,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贸易转移至中国,形成“境外采购—境内生产—境外销售”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出口加工贸易顺差为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高储蓄和低消费特征抑制了国内需求,促使生产要素向出口部门流动,助推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特别是为国内电力和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完善提供了资金保障。通过对外贸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出口加工贸易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995 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首次取代纺织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这是中国由劳动密集型贸易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贸易转变的标志,中国对外贸易逐渐走向以技术促发展的新阶段。

(3) 从 WTO 到经济“新常态”: 对外贸易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实现经济高附加值增长

全球价值链是企业间组织的全球网络,通过将生产、销售、回收和处理商品或服务过程联系起来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随着跨国生产网络的构建和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基于产品内分工的生产链布局可以使参与国获得更多产品增加值(Gereffi 等, 1999; 2001)。在生产流程复杂化和国际分工精细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程度,促使出口多元化,为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新机遇。

进入 21 世纪,人口红利渐失,外贸经济增长方式随之发生变化。虽然中国是否处于“刘易斯拐点”问题在学界尚存争议,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结构性失衡已是不争的事实。WTO 的加入为中国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贸易转变提供了新的契机。加入 WTO 后,通过对外贸易中国更为深刻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程大中 2015; 张会清和翟孝强 2018)。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造业水平不断上升,由初级产品出口国发展为制成品大国,服务型高附加值贸易稳步发展,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对外贸易格局,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刘维林, 2015; 王岚和李宏艳 2015; 乔小勇等 2017)。通过招商引资,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商业模式对中国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奠定了基础(吕越等 2018; 詹晓宁和欧阳永福 2018)。

经过不断发展,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不断培育出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中国制造”的身影日渐显现,出口主导产业从轻工纺织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逐步摆脱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高铁、航空航天和电信通讯等高附加值产品正以稳健的步伐扩大海外市场,对外贸易开始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图 10 和图 11 绘制了中国 GVC 参与度情况,参与度是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前向参与度越高表明一国出口中的本国附加值越高,外国附加值越低,后向参与度则与此相反。图 10 表明,中国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与中国长期以来进口中间品、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贸易特征有关,决定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要高于前向参与度。但与此同时,中国前向参与度也在稳步提升,从 2001 年起,中国 GVC 前向参与度明显

提高,与后向参与度的差距在减小。从图 11 所示的制造业层次来看,2001~2011 年间,忽略金融危机时期,几乎所有制造业前后向参与度都有所提升,这反映了前端中间品生产和后端加工制造的工序都在逐步延伸,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前端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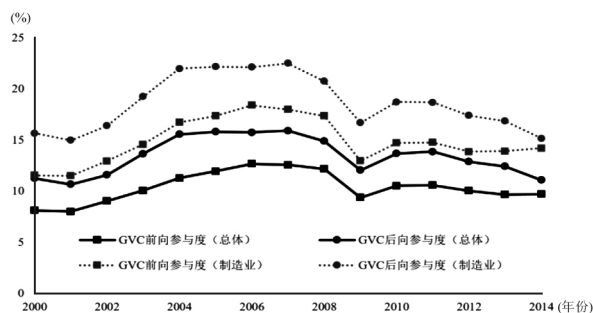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 GVC 参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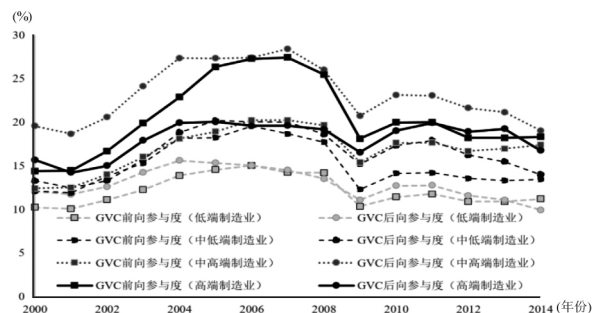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分行业 GVC 参与度

注: 图为笔者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icators)进一步细分计算所得。

(4) 经济“新常态”至今: 新型贸易模式为经济增长添加新动能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Romer,1986)。研发设计可以推动企业内生性技术进步,使企业摆脱总量水平上的报酬递减束缚(Aghion 和 Howitt,1995; Redding,1996; 张若雪,2010)。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来看,这一机理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贸易转型升级带来的技术进步和革新使生产率的提升大于劳动工资的提升,单位劳动成本逐渐下降(Rodrik 和 Subramanian,2004; 袁富华等,2015; 孙海波等,2018);二是技术又附加于人力资本的深化反作用于企业,使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在引进和吸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创新,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提升产品竞争力。最终,生产技术的上升与人力资本的深化形成良性互动,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 Herrendorf 等,2013; Swiecki,2017; 毛其淋,2019)。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不断,外部需求不足。从 2012 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人口及其占比双双下降,不断攀升的用工成本日益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强化以开放促改革,依靠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方面,严峻的贸易环境客观上对中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了倒逼机制,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新技术密集产业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不断涌现出华为、中兴、联想、大疆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以自贸(港)区与“一带一路”为平台,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反映年轻群体消费理念的进口生鲜、冰鲜、食品、保健品、母婴用品、医美用品和汽车成为贸易“新宠”,反映赡养老人以及符合老年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养老产业兴起,养老医药和康复商品等进口规模大增。在重塑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同时,围绕跨境电商诞生了新的庞大经济链,“消费端反向影响制造端”在带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机理的反思

(1) 对外贸易不断推动经贸制度创新与发展,是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刻内涵

梳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对外贸易对中国经贸制度创新与发展的推动是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刻内涵。正是中国在开放过程中不断适应内外变化,及时调整思路、大胆探索,创新经贸模式,从而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制度变迁理论的创立者 North(1990)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有赖于制度创新,所谓“技术进步”

“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仍是增长本身。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机理的发展衍变就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参照苏联“调拨制”,由国家统一向外贸企业下达进出口计划、调拨货源、规定价格、承担收支和盈亏。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一对外贸易体制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出现了计划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现象。国民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对外贸易体制就需要变革。1956年底,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内贸”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外贸”体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开始逐渐从“调拨制”向“收购制”转变。此时,外贸企业可以根据国家计划和国际市场供求向国内企业收购产品并组织出口。自主权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经济效益与市场活力也显著提升。随着“收购制”下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责权利的矛盾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被放大,1984年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取消“收购制”,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审批代理制。通过政府的审批干预,纠正了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市场的混乱局面,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各产业向均衡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不断得以完善。然而,审批代理制包含了较多的计划经济成分,造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门槛。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际,承诺把外贸经营权从审批制转变为登记制,并在三年内取消外贸许可制度。2004年,中国如期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登记代理制度,此举激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活力,贸易规模和产品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全球化新变局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在全球互联互通和自由贸易进程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自贸(港)区和多种形式的贸易网络快速发展,贸易便利化程度持续提升,逐步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度安排。在新的开放格局下,贸易投资愈发活跃,跨境电子商务、直邮代购等贸易创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调拨制”“收购制”到“审批代理制”“登记代理制”,再到“‘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度”,对外贸易不仅是商品交换的过程,还是依附于商品的不同文化、制度、政策等交流、借鉴与协调的过程。为提升贸易便利化和高效化而进行的经贸制度改革与创新增强了贸易国互利互信,降低了因制度摩擦而造成的贸易成本,促使经贸活力显著提升。

(2) 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完备的工业体系和教育改革是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

从贸易角度纵观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推行贸易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却只有中国获得了快速、稳定的发展。究其原因,贸易推动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

首先是坚强的制度保障。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经济活动的摩擦成本,继而通过影响生产效率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推进经济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保障。这一经济制度既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发挥政府的作用,保障区域相对均衡发展,保障行业的良性竞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被激活,民营企业竞争力和创造力不断提升,为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中国正进一步发挥开放引领作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贸易新体制。在制度保障方面,全国不断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加快建设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和电子商务结算中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体系;优化法制保障环境,加强与国际商事和海事领域机构合作,建立与国际一致的法规体系。在不断健全的制度保障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正依托自贸区和保税港区等平台,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在政策引导下,跨境电商、平行进口汽车和转口贸易等新型服务贸易业态快速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前建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独立发展和对外贸易扬

帆起航提供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前苏联建议中国工业化采取“经互会的方式”,即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定范围内分工合作,实行一体化生产。但是,新中国领导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这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钢铁、化工和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项目落地,工业化基础逐步构建起来。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总结过往经验教训,进一步将建设目标从“工业体系”向更为全面和均衡的“经济体系”转变。1964年,中国提出“两步走”发展设想,到改革开放前基本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得益于前期工业化铺垫,中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成为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通过经贸往来,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激发企业创新精神和改革意识,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不但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跨越,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最后,教育改革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科教兴国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提供了保障。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和方向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水平和方向,科教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核心内容之一。从恢复高考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从“科教兴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政策引导和不断深化改革,中国形成了有利于人力资本深化、经济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运转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对市场主体、科研院所、高校等主体的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不断提高,注重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特别是不断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降低了企业科技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科技创新正在发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从2012年开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连续七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等教育形式不断发展,城乡教育差异逐步缩小,劳动力学习成本不断降低,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激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力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得益于此,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内涵式增长方面呈现出新特征。从贸易品进口来看,进口消费品层次不断提升,用于享受和发展的文化产品进口比重持续提高,先进的商业模式、生产工艺、管理方法和知识产权不断被引进和优化,为人力资本深化提供了保障。从贸易品出口来看,在劳动力规模和资源约束下,对外贸易通过生产率的提升仍然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淘汰了部分“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低效益”的对外贸易部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逐渐从初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五、新时代对外贸易发展展望

随着中国生产技术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初步形成了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的良好发展模式。劳动力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融入国际生产网络,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渐增强。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着一些内外环境的制约。

1. 对外贸易发展的机遇: 深化改革正在汇聚磅礴动力

(1) 比较优势上,人口红利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显著提升,为改善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高素质人才队伍日渐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除普通高等院校不断扩招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成人高考、开放大学等成人继续教育方式的改革,使劳动力终身学习体系不断完善,劳动力整体素质增强,对外贸易相关专业体系设置愈发全面和完善。

在产业政策上,中国把技能人才培养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能人才支撑。通过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培养新生代产业工人,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制造业技能人才质量不断提高,学习型、研究型和创新型等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要求的技能人才不断涌现,劳动力存量正从数量向质量转变。2018年,《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审议通过并开始落实,在技术工人培养、评价、使用、激励和保障等方面的措施进一步完善,为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提供了人才支撑。

(2) 对内改革上,外贸营商环境日趋完善

一方面,培育了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贸易新业态,促进了市场多元化的发展,为外贸稳中提质提供了新动能。中国当前拥有 3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 15 个试点城市,基本覆盖一、二线城市。通过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服务平台,配套物流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海外仓储的建设扩大了中国贸易覆盖面,并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电商零售出口实行“无票免税”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政策环境更为宽松,持续推进对外贸易营商环境改革,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度。国务院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出台了更加便利企业的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加快出口退税进度,财税政策不断完善;强化金融支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合理降低保费;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取消行政性收费,压缩跨境贸易的时间和成本。

(3) 对外开放上,更高格局的对外开放拓宽了贸易领域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贸易市场进一步多元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行动计划稳步推进,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贸易投资方式不断创新,贸易通畅性取得积极进展,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保持增长势头,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和发展渠道。另一方面,自贸区网络建设加快,贸易投资进一步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把自贸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建设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自贸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4) 对外贸易结构上,扩大进口,持续降低关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对外贸易也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8年7月《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意见的通知》和2019年12月《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相继发布,详细阐释了当前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代表,扩大进口成为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主动扩大进口既是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态度表达,也是促进经济转型、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中国持续降低工业领域技术升级与创新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口关税,大大减轻了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压力,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扩大普通消费品和服务品的进口给国内厂商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也在产品质量、款式设计、工艺改进和售后服务等方面为国内产品的自主研发与创新提供了标尺。

2. 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内部转型与外部摩擦共存

虽然当前中国外贸高质量提升步伐正在加快,但是大量的外贸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高端打压,发展中国家低端逼近,对外贸易资源重新配置窗口缩小,受投入要素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亦面临瓶颈。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复杂外贸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诸多挑战。

(1) 生产成本上升压缩了低附加值贸易利润空间

一方面,在劳动力增速放缓、工资上涨和新兴产业虹吸效应等综合作用下,加工制造业用工成本明显上涨。同时,物流、快递和外卖等新服务型行业吸引了更多进城务工青年,工作内容单一、时间长、强

度大的外贸企业生产一线辉煌不再。受此影响,大型外贸企业开始向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欠发达地区转移,虽然有助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更多的国内代加工和贴牌小厂生存艰难。

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上升明显,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其原因有二:一是在高质量发展要求倒逼机制下,环保不达标且低端落后的产能被淘汰,技术改造以及高质量产能短期内供给不足,导致原材料供需结构失衡,价格上涨。二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化工原材料依赖进口,特别是化纤丝、钛白粉、萤石和氢氟酸等重要化工原材料国内缺少替代品,严重依赖进口,议价权不强,容易导致化工原材料高进口成本波及全产业链。

(2) 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走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亦面临瓶颈

资本形成率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而资本形成率与储蓄率息息相关。当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中的居民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双双走低,其中家庭平均储蓄率下降明显,居民净存款自 2013 年开始呈现零增长。这一方面源于高房贷、子女教育和医疗支出消耗了大部分储蓄,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使储蓄人口下降,而纯消费的老年人群比重上升。居民储蓄的快速消耗为经济生产部门资本形成埋下隐患,即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所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不能仅仅通过银行放贷创造信用货币缓解燃眉之急,长期来看需要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支撑。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有垄断特权的国有企业利润增长虽快,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利润却被留存在企业内部,即使大型国有企业担负起政府储蓄的职能,这种简单的红利转移也难以弥补居民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缺口,加之资金很难转移到中小企业身上,这进一步拉低了资本形成率。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虽然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基本消除了资源配置失衡产生的经济扭曲问题,但随着经济增长达到更高的水平,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来解决根深蒂固的经济结构刚性问题愈发困难,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及其收益的兑现已经不及过去。大部分出口加工制造企业仍然遵循着从国外进口精密核心零件,将其组装成最终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生产逻辑。尽管在贸易统计上中国出口了大量高技术产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仍任重道远。

(3) 贸易结构不平衡,核心技术缺失,尖端科技受制于人

服装、纺织和塑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货物贸易仍然占出口贸易的较大比重,具有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大的特征。特别是对于来料加工、订单型加工贸易而言,如果国外采购商减少采购需求或趁机提出不合理要求,按照订单生产的商品很难二次销售,对加工厂商形成被动,如果上游供应商货物在途,那么加工厂商受损更多。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压力增大,尤其是一些国家对中国部分出口产业设置贸易壁垒,使得外贸加工企业出口订单锐减,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中广播影视、动漫游戏、视觉艺术、工艺与设计等高附加值文化产品出口相对薄弱。虽然国内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稳步提高,中国也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艺术品市场和主题娱乐市场,但中国真正被世界接受的文化输出产品并不多。除因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导致中国文化输出较难被西方市场接受外,中国文化产品全球影响力与同属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文化产业作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助力经济转型、高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尚需探索和创新文化输出模式,扩大文化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在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大部分核心技术被国外所掌控,尖端科技产品研发制造是对外贸易短板,导致科技产品受制于人。特别是高端芯片设计和研发,由于缺乏自主架构,自给率很低。在国际贸易中,高科技发达国家运用技术壁垒提高市场的准入条件,使得一些不达标企业面临出口难问题。同时,由于核心技术和设备大多依赖进口,成本投入大,导致中国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较贵,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虽然中国在科技和专利方面每年发表的 SCI 论文数和申请的专利数已是全球第二,但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和实际产品出口获利仍需时日。

(4) 外部环境依然严峻, 贸易摩擦与贸易壁垒夹击

近年来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一方面, 区域化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和多边服务业协议 (TISA) 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另一方面, 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不断引发欧美国家反倾销调查, 以防中国产品对当地企业形成挤出并扰乱其市场秩序。这不但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也使得中国商品承担了不该有的税收负担, 失去价格优势。

技术封锁和专利打压形成的壁垒强化了科技企业和高端制造业的进口依赖, 出口品难以形成竞争优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由来已久, 特别是将数控机床和超级计算机芯片等商品列为对华出口敏感物资。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 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 防范并遏制中国在高端制造、电信和芯片等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开展全面的竞争。美国施加到中国商品上的关税, 通过采购商提出共担关税的要求传导至中国生产企业, 中国为维持产能和经贸关系而被迫承担部分关税。并且, 由于高科技专利掌握在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手中, 中国科技产品生产需要缴纳不菲的专利费, 在国际市场较难形成价格优势。

六、新时代对外贸易发展建议: 内强实力、外铸活力

当前, 全球经济处于经济危机发生后的调整过渡期, 经济增长动力衰退和经济环境恶化轮番上演, 美欧对国际市场增量需求的主导作用减弱, 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观念不断增强, 不断加大对国际贸易的限制措施, 给国际贸易的开展带来巨大压力。随着近几年中国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 增量需求放缓, 产出缺口开始加大, 同时对外贸易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渐失, 对外贸易结构尚待进一步完善。

1.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加快劳动力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完善并加强对高质量劳动力培养模式的创新,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提升教育质量, 为劳动力质量提升打下坚实的文化素质基础; 注重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 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 重视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提升劳动力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发挥继续教育的作用, 树立终身教育理念, 更新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术和方法, 从而提高劳动力质量,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 促进中西部劳动力质量的提升, 提升中国整体劳动力质量。

二要及时引进国际先进产品和生产技术, 加强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 增强科研投入, 保证研发创新的持续性, 以促进技术和实际经济发展需求相符合, 提高科研的产出效率和质量, 更好地将知识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促进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随着对外贸易和 FDI 等渠道获取存量技术外溢的效应减弱, 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技术研发与制度创新, 因此要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与利用效率, 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让企业充分竞争, 推动新技术的研发与运用。

三要纠正劳动力结构性失衡, 引导丧失比较优势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出口企业转移到内陆和西部省区; 推进城镇化进程, 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拓展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 打通劳动力流动渠道, 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 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2. 基于综保区(港)、自贸区(港)完善政策, 创新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

自 2013 年 12 月上海自贸区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平台“跨境通”以来, 基于自贸区(港)形成了保税、完税、免税“存展销”一体化和“产地直达”的贸易模式, 催生天猫国际、网易考拉、唯品国际、亚马逊全球购和苏宁易购等优势跨境电商平台。除国内电商平台快速发展外, 全球消费升级持续发力, 全球跨境电商发展如火如荼。在消费升级背景下, 未来应以跨境电商促进经济增长为对外贸易的发力点, 进一

步完善跨境电商进出境货物管理模式,鼓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供通关、物流、仓储和融资等全方位服务,以及开发农村跨境电商等。

一要精简检验检疫监管流程,提升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便利度。简化行政手续,探索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及商品备案管理制度。提升跨境支付结算的服务能力,鼓励境内银行和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跨境电子支付业务,在加强大额在线交易监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尽量满足境内外企业及个人跨境电子支付需要。为跨境电商提供金融支持,探索适合跨境电商发展的金融支持模式,为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

二要鼓励企业加大海外建仓力度,完善冷链物流体系。海外建仓是突破跨境物流瓶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以大宗运输替代零散小包运输降低物流成本,缩短配送时间,实现供应链效率的提升和本地化。因此要提高跨境物流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构建数据平台提升跨境电商信息处理能力,采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管理物流信息并整合供应链信息;推动跨境物流标准化发展,推动跨境物流服务的运输工具、包装、装卸和仓储等方面采用统一标准,以标准化提高物流速度和效率;支持国内龙头物流企业开展跨境物流业务,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体系,引导物流运营模式向国际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三要发展农村跨境电商,拓展农产品海外市场。跨境电商模式下的农产品出口有着天然的价格优势,中国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要完善跨境电商农产品出口质量认证体系,通过跨境电商模式下“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根据质量的不同建立严格的农产品等级制度,减少同质化恶性竞争;搭建专门服务国外客户的跨境农产品售后服务平台,完善农产品售后服务,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减少中间商数量,简化采购过程,节约采购成本,直接让农民获利。

3. 乘政策东风提质升级,保持对外贸易相对优势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跃升

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加工贸易向东南亚国家的迁移以及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崛起,中国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对外开放政策优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进一步实现价值链跃升。

一要延长国内的价值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将低附加值初加工贸易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外贸产业集聚,重塑加工贸易优势;提高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稳中提质,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加强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发展,提高服务贸易占比;发挥民营企业积极性,引导民营企业向高新技术和高端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通过差异化的出口退税和信贷政策对特殊行业给予针对性激励;引导资金向高生产率产业流动,减少在高能耗、低产出贸易部门的投资。

二要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一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参与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各类经济体系,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引领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的发展权益,捍卫自己的贸易成果。另一方面,形成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体系,降低投资风险。除将部分基础产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沿线国家外,还应将部分优势产业和技术惠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助推沿线国家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互鉴与知识流通,分享优势资源,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和稳定的区域价值链,实现共同发展。

三要采取综合措施迎接国内外形势的挑战。在拓展国外市场的同时,应注重国内消费升级和需求增长,增加企业产品内需;消除市场分割,增强区域间竞争,推动从沿海向内陆、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强调差异化竞争,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形成对外贸易优势,强化区域间在产业链上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效应;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建立自主技术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Howitt P.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M].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95: 101-122.
- [2] Bloom D E,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419-455.
- [3] Choudhry M T, Elhorst J P.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J]. Economic Systems, 2010, 34(3): 218-236.
- [4] Gereffi G, J Humphrey, Raphael Kaplinsky, Timothy J. Sturgeon. Introduction: Globalisation,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J]. Ids Bulletin, 2001, 32(3): 1-8.
- [5] Herrendorf B, Herrington C, Valentinyi A. Sectoral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 IEHAS Discussion Papers, 2012, 7(4): 104-133.
- [6] Lewis, Arthur W.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M].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 [7] North Dougla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Nurkse R.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 Punjab University Economist, 1966, 2(4): 1-23.
- [9] Redding S. The Low-Skill, Low-Quality Trap: Strategic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R & D[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435): 458-470.
- [10] Ricardo 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M]. G. Bell and Sons, 1891.
- [11] Rodrik D, Subramanian A. Why India Can Grow At 7 Percent a Year or More; Projections and Reflections[J]. IMF Working Papers, 2004, 39(16): 1591-1596.
- [12]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1002-1037.
- [13] Soyres F, Mulabdic A, Murray S, Rocha N, Ruta M. How Much Wil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duce Trade Cost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59(C): 151-164.
- [14] Swiecki T. Determinants of Structural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7, 24: 95-131.
- [15] UNPF.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 Summary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UN population fund[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998, 2(4): 87-92.
- [16]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9[R].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No. 30438, 2019.
- [17]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4): 5-14.
- [18] 程大中.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J]. 经济研究, 2015(9): 4-16.
- [19] 戴翔, 刘梦. 人才何以成为红利——源于价值链攀升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361(4): 105-123.
- [20] 刘方龙, 吴能全. “就业难”背景下的企业人力资本影响机制——基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12): 145-159.
- [21] 刘维林. 中国式出口的价值创造之谜: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析[J]. 世界经济, 2015(3): 3-28.
- [22] 陆旻, 蔡昉.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 世界经济, 2014(1): 5-31.
- [23] 李俊, 李西林, 崔艳新.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24] 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J]. 管理世界, 2018(8): 11-29.
- [25] 毛其淋. 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 [J]. 经济研究, 2019, 54(1): 54-69.
- [26] 乔小勇, 王耕, 郑晨曦. 我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研究——基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2): 99-113.
- [27] 孙海波, 刘忠璐, 林秀梅. 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深化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8(1): 56-68.
- [28] 王岚, 李宏艳.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2): 78-90.
- [29] 袁富华, 张平, 陆明涛. 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J]. 经济学动态, 2015(5): 13-23.
- [30] 詹晓宁, 欧阳永福. 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 管理世界, 2018(3): 78-86.
- [31] 张会清, 翟孝强.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35): 3-22.
- [32] 张若雪. 人力资本、技术采用与产业结构升级[J]. 财经科学, 2010(2): 72-80.
- [33] 张同斌.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兼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J]. 经济科学, 2017(5): 5-17.
- [34]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J]. 经济研究, 2007(10): 4-16.

(责任编辑: 王丽娟)

《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 37 •

Contents & Abstracts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improve the labor misallocatio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Zhou Shen Hai Peng Zhang Long(3)

Taking China's entry into WTO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influenc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labor resource mismatch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mechanism a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DI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rade liberalization of both final and intermediate goods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egree of lab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ariff reduction of intermediate goods has a greater impact than that of final goods. This conclusion holds even after consider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ypothesis and a number of other factors that may interfere with the estimation results. (2) The pro-competition effect of out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ntry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labor mismatching by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market share between efficient and inefficient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3) Regional marketisation can reinforce the impact of both type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allocation of labour resources, which means that higher levels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the labor resource mismatch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ourses, Mechanism and Future Prospec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70 years

Yin Zhichao Peng Hongfeng(19)

Review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e find that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Firstly, foreign trade moved forward in difficult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P. R China. Secondly, foreign trade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rdly,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tr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after joining in the WTO. Lastly, in the contex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multi-dimensional opening pattern formed by the Free Trade Zon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Among them, trade in goods,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trade surplus,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trade in services, it starts to soar in the past decade, and although the trade deficit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remaining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it is foreseeable with a fancy future.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derivation and rethinking of the 70-year mechanism of foreign trad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foreign trade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promo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novation models, and quality upgrading to achieve value chain leapfrogging.

Anti-Dumping Due to Doubl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 Expor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Gu Zhenhua(38)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tandard trad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actical causes of anti-dumping caused by China's 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xporters from 2004 to 2013, the article verifies the synergistic impact of both types of policies on enterprises subjected to anti-dumping through a mixed OLS approach and a fixed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impact under both 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will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anti-dumping products against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while the role of a single policy is not very obvious; secondly, the effect of both types of policies towa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re prominent; thirdly, the dual role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helps export companies to conduct low-cost export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possibl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son for them being subjected to anti-dumping.